

匪俄關係新發展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錄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五十九年元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會議室舉行第卅八次學術座談會，討論題目為「匪俄關係新發展」。座談會由該所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應邀出席之專家學者計有桑原壽二（日本研究大陸問題專家）、項迺光、王健民、施岳、王修誥、金達凱、周之鳴、鄧公玄、郭乾輝、孫桂籍、李天民、札奇斯欽、馮達、尹慶耀、陳元、張棟材、呂律、關素質、鄭宇光、陳森文、張鎮邦、操禪青、蘇良弼、姚孟軒、胡傳厚、朱文琳、汪學文、王蘊、劉懋枏、趙倩、張虎、張欣南、江嘉永等卅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今天是本所第卅八次的學術座談會，能够請到各位在百忙中來參加開會，非常感謝，特別是我們有一位貴賓——桑原壽二教授，也能出席座談會，使我們有機會聽到他的高見，更感到非常榮幸。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題目是「匪俄關係新發展」。記得本所的第一次座談會就是討論的匪俄關係。現在我們已舉行到第三十一次，已經是六年的時間了。匪俄關係是舉世注目的問題，各位都是這個問題的專家。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我想主要是着重在下列三方面：第一、我們要從匪俄關係演變的歷史發展中找出它發展的背景、線索，它每個階段的特徵和運用的策略。第二、注意當前匪俄關係的演變。匪俄當前的關係每天都在變。這種演變將來究竟會發展成何種情況？有的人認為會有全面戰爭的可能；也有的人判斷匪俄儘管衝突非常激烈，却不會全面軍事衝突；當然還有人認為，不管匪俄關係如何演變，保持現在的趨勢比較可能。因此，關於匪俄關係，究竟是一種戰爭的可能性？還是一種拖延的局面？還是有可能化為和解？是當前研究匪俄關係所特別重視的。我們也要作一個很客觀、很冷靜的分析。第三、匪俄關係是匪俄雙方主觀的一種策略，雙方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運用這種關係。共匪運用，蘇俄也運用，此外其他國家，特別是自由世界也在運用這個關係。但是運用不當時，就自由世界來說，不但不能有所收獲，反而因為步調不一而影響到整個自由世界的對匪俄鬥爭，關於這一點，頗值得我們討論。在沒有請各位發言前，谷正鼎先生有個書面意見，先請劉懋枏先生宣讀。

谷正鼎先生：

對匪俄關係應有九點原則認識

才不致爲臨時發生現象所迷亂

我們對匪俄關係應有下列的原則認識，由此認識以判斷其動向，才不致爲臨時現象所迷亂：

(一)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係蘇俄在中國所製造與培養，共匪竊據中國大陸，係由於蘇俄的大力援助，蘇俄現已公開承認。

(二) 毛匪曾公開申言，堅決一面倒向蘇俄。毛匪朝俄自認爲史達林的學生，事史達林爲師，並訂有祕密條約，使蘇俄得更進一步的對中國壓榨與剝削。

(三) 自俄共第二十次大會，清算史達林後，共匪與蘇俄的關係由此逐漸惡化，鬥爭愈演愈烈，致演成不斷的邊境軍事衝突。

(四) 在毛匪臣服蘇俄、匪俄關係和好時，中俄無邊境衝突。自匪俄關係惡化後，乃始有邊境軍事衝突發生。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以全世界爲版圖規模的，中國共匪在江西時曾成立蘇維埃政府，即爲蘇聯之一部。

共產國家在理論上應當無國界的，今匪俄發生邊境衝突，對共產教條實是一大諷刺。

(五) 匪俄邊境衝突，係共產集團內的俄共與中共的權力鬥爭的表演，換言之即國際共產黨陣容內的派系鬥爭演進的結果。因共匪之「反修正主義」與俄共之「反教條主義」都是共黨內部鬥爭的口號，中俄兩國人民對之均不感興趣。故共匪與俄共雙方均必須假藉「領土」問題以刺激民族意識，作爲運動員宣傳之號召。

(六) 中共匪黨與俄共的思想鬥爭，及國際共黨的世界領導權的爭奪，是軍事衝突的因素。中俄二國邊境毗連，長達四千五百哩，此戰爭因素之存在與發展，自有形成戰爭的可能。匪俄間的思想、組織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鬥爭。縱毛匪死倒，此鬥爭形式仍將繼續，不會有根本的改變。當匪俄談判將恢復時，共匪曾於去年十月七日申明：「中蘇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

原則分歧，中蘇之間的原則鬥爭是要長期進行下去的。」在共產黨內的原則鬥爭，就是組織鬥爭。是要用殺伐來解決的。邊境衝突是現象，思想原則鬥爭才是原因。

(七) 依共產黨的傳統，對其黨內反對者之敵視與殘酷，遠甚於對黨外者。布里茲涅夫的「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即爲蘇俄鎮壓其附庸之原則。無論毛匪如何囂張，蘇俄仍視之爲附庸叛逆，終將對之撲滅。

(八) 我們應揭破毛匪對蘇俄的漢奸本質，使其不能假藉「民族主義」爲僞裝，以爲其個人權力鬥爭的工具。吳三桂賣國於先，雖其後「反清」，但並不能洗去漢奸之罪名。毛匪曾向蘇俄賣國求榮，現雖反俄，而其漢奸之罪，實不容誅。

(九) 我們應強調爭取國家之獨立自由，我們要除奸禦侮，光復大陸，消滅毛匪，並根據聯合國憲章，以維持亞洲之和平。

根據以上各點的原則，我們來看今天座談會的題目：「匪俄關係的新發展。」在外交折衝方面，蘇俄在歐洲因附庸國之攜貳與追求自由，尤其是出兵佔捷克後，更遭受西歐各國共黨之譴責，而在亞洲又有毛匪的反叛，致形成兩面受敵之形勢，其對世界共黨的領導權正受着共匪之挑戰。蘇俄現在西方試圖緩和緊張，俾得集中力量在亞洲對付共匪，故有赫爾辛基的美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之舉行，及歐洲安全會議之行將召集，而匪共亦乘美國希望改善與匪關係之際，與美國恢復華沙談判，企圖借美以抗俄。在政治方面彼此均在對方內部策動顛覆。在軍事方面，雙方調集重兵於邊境，劍拔弩張，而匪更動員備戰，岌岌不可終日。

美、俄、匪的三角關係，錯綜複雜。匪俄衝突對自由世界是有利的。但美國現圖於其間作謀略之運用，一面與俄談判，一面希與匪改善關係。如運用不當，反可促使美俄關係緩和，暗中協以對美。美國對共黨認識不清，外交技術低能，是不够在匪俄之間作謀略運用的，畫虎不成，反類其犬。我以爲美國對現階段匪俄鬥爭，只宜嚴守中立。而美國的根本要圖，還是在加強自由國家的團結合作，以鞏固並擴大自由陣容，尤其在亞洲方面更須如此。談判是共黨另一鬥爭的方式，無論美俄談判，匪俄談判，或美匪談判都不會有結果的。縱有協議，終亦將爲共黨所破壞。在共黨看來，條約等於廢紙，隨時可訂，隨時可毀。

至於題目中最後一點：「匪俄關係的展望」，我認為和的可能性很少，可以說沒有。北平匪俄談判迄無協議，縱有協議，亦難持久。不戰不和的時間不會拖得太長，而戰爭的可能性終將到來。共產國家間的戰爭，現已不是虛渺，而已成為現實。蘇俄對匈牙利之血腥鎮壓，及出兵佔領捷克，假設匈捷兩國，是強國而有力抵抗，則戰爭早已發生。匪俄兩黨異地皆然。

陳森文先生：

匪俄「同惡相濟」「殊途同歸」

自由世界對此點應勿忽視

一、匪俄鬥爭的背景

匪俄之間的鬥爭，出現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代發展，例如核子太空時代的出現和核子的空前破壞力，民主和極權兩大陣營對立形勢下共產主義和共產集團的沒落，蘇俄在經濟與核子競賽中的落後，民主陣營集體安全體制的建立，歐洲共同市場的成立，資本主義制度逐步走向「福利國家」的新發展，以及各殖民地國家的相繼獨立和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消逝等等，都迫使蘇俄基於其國家安全與利益，及其所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得不對其主觀和客觀形勢的估計作全面性的檢討，並修正蘇俄的國家戰略和全球戰略，以及其赤化世界的全盤戰略和策略。

史達林在世時，這種修正或許不成問題，由於他的獨裁地位，他的一言一動，就是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權威」和「正統」，各國共產黨只有唯命是從。毛匪也是在「一邊倒」的政策下，甘居史達林的頭號奴才地位。可是，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的死亡，不但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和獨裁者，而且導致了俄共對國際共黨控制力的削弱和消失，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思想上的混亂，政治上的分歧和組織上的分裂危機。

二、匪俄之間的基本矛盾

匪俄之間的分歧，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產生於一九五六年二月之俄共二十次大會。黑魯曉夫在大會上，一方面以反對「個人迷信」為名，發動了清算史達林運動；另一方面，則針對時代發展的新形勢，以及國際階級鬥爭敵我力量的對比，提出了赤化世界的修正路線，也就是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

當時，毛匪對於俄共這項突然轉變的新決定，就有了強烈不滿的反應。因為毛匪是小史達林，如果響應黑魯曉夫的反史運動，無異否定了他在匪黨內部的獨裁地位；而且當時毛匪正在大反右傾，對內加速推行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三改」運動，對外加強推行其「三大法寶」的左傾路線，如果接受黑魯曉夫的「三和路線」，也無異否定了他的對內對外的政策路線；加之，在毛匪的心目中，瞧不起黑魯曉夫，認為他的資歷淺，缺乏鬥爭經驗，不夠資格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此，毛匪自始即拒絕接受俄共這項新決定，首先對清算史達林及「個人迷信」等問題表示異議，但俄共仍通過各種壓力，促使匪黨召開「八全大會」，修改黨章，刪除舊黨章有關對毛匪「個人迷信」字句，並改行「集體領導」制，另增設名譽主席一人，為毛匪以後下台預留伏筆。從此匪俄之間，也就由黑毛之間的權力鬥爭，逐漸演變為思想理論、政策路線的分歧鬥爭，並發展為兩黨、兩個政權之間的分裂、對立和不斷衝突；而毛匪的對內對外政策，也走向更為極端的左傾冒險路線，並進一步由毛匪的保權鬥爭，逐步發展為公開向俄共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挑戰，全面攻擊和否定俄共的「修正主義路線」，再擴展為雙方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爭奪戰，互相搞分裂和顛覆活動。而匪黨「八全大會」的結果，和匪俄擴大鬥爭的影響，也就成為最近十多年來匪黨內部不斷發生權力鬥爭、政策分歧，乃至演變成這次「文革」大動亂的主要因素。從珍寶島事件以後，雙方更由邊界武裝衝突的不斷擴大，而面臨了戰爭的邊緣。從以上所述匪俄鬥爭發生的起源和演變的過程來看，顯然雙方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現在權力鬥爭。蘇俄最初為反史運動而要迫毛自貶其獨裁地位，繼因迫毛就範不成而要倒毛，而毛匪為保持其權力與地位，亦由保權鬥爭發展為

反俄鬥爭，再擴展為與俄共爭奪國際共黨領導權的鬥爭。至於雙方關於思想理論、政策路線、以及政治經濟和邊界衝突的各種鬥爭，實質上都是從這一起基本矛盾出發，圍繞這一權力鬥爭的中心而不斷加劇和擴大。而導致這一權力鬥爭的根源，主要是由於核子時代的發展和共產主義的沒落。

三、匪俄赤化策略的異同

俄共所提出的赤化世界的策略，就是上述所謂「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係偏重於和平鬥爭策略的運用，但並未完全放棄或否定暴力手段。它是沿用其傳統的、以蘇俄為根據地、從東西兩翼夾攻資本主義世界的戰略部署，把以蘇俄為首的「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和各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國際工人運動」看作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而把由「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和「國際工人運動」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看作是直接後備力量。

匪黨所提出的赤化路線，則與俄共相反，是以「暴力革命」為主的左傾冒險路線，但也並未完全放棄或否定和平鬥爭策略的運用。它認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由法國、德國和俄國轉移到北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也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從而提出以中國大陸為根據地，由「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最後赤化世界的全世界人民戰爭路線。這一戰略路線，實際上是把「民族解放運動」和由親匪共黨（包括分裂組織）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和「人民鬥爭」，當作是赤化世界的基本力量，而把「國際工人運動」放在從屬地位。

由於匪俄雙方所提出的赤化世界的策略有分歧，對於運用所謂「革命的兩手」（即暴力手段與和平手段），亦有主從的不同，因而雙方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上，也就各行其是，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但是應該特別注意，雙方對赤化世界的策略手段雖有分歧，可是雙方都是以埋葬資本主義世界，完成「世界革命」作為它們的共同目標，實有「同惡相濟」「殊途同歸」的共同作用。自由世界在觀察匪俄鬥爭的問題時，如果忽略了這一點，就難免犯了「見樹不見林」的錯誤。

對匪俄關係的展望，亦即未來如何變化，牽涉頗為複雜，國際上各種因素，都對他們的關係發生程度不同的影響，限於時間，本人僅能扼要提供個人的幾點看法。

第一，在毛匪澤東軍事恐怖統治中國大陸的現狀，共匪與蘇聯的對立衝突關係，只有愈來愈深刻，愈來愈尖銳，而無和解與合作的可能。這應從兩方面加以剖析。就毛匪言，如和蘇聯妥協，即是放棄反俄反修的旗幟，亦即是捲起了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丟棄了以反俄做為對內政治運用的政治工具，無異是毛匪對俄共的投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屈服，而更加速其獨夫的失敗；就蘇聯言，毛共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反俄政策，在全中國大陸進行極為廣泛與深入的反俄仇俄行動與叫戰備戰政策，是現實最大的困擾，而在未來的演變上，毛澤東思想，七億以上的人民進行全面仇俄活動，核子武器的拼力發展，亦不能忽視其對蘇聯的憂慮。因此，我們可以判斷，在毛共存在的時候，匪俄關係是沒有和解與妥協的可能。

但如果，毛共死後呢？我認為毛死後的中國大陸，將是地方主義抬頭，中央權力鬥爭，地方割據分裂，匪幹反毛與人民反共趨於匯流，造成非常混亂的局勢，而沒有統一的對象，可以談妥協與合作了。

第二，現在匪俄衝突鬥爭的持續中，俄處於主動的地位，亦即基本上採取攻勢的地位，所以，我首從蘇聯說起。蘇聯想要改變中國大陸的現狀，亦即推翻毛匪澤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是極為迫切的。但是用什麼手段來達成蘇聯這一政治上的企圖？能不能達成這一企圖呢？就蘇聯言，就今日世界恐戰厭戰的氣氛言，最好的辦法是用政治的手段，即是通過滲透達到顛覆的目的，但這一條路是很難行通的，也即是蘇聯沒有能力，採取滲透顛覆的手段，達到推翻毛匪的目的。首先是可以為蘇聯所運用的反毛領袖份子，如劉少奇、彭真、彭德懷、羅瑞卿、賀龍等，都成為毛匪的階下囚，階下囚自身尚且

項迺光先生：

匪俄關係展望沒有和的可能

不保，已經失去了一個普通人的反抗能力，又何能談對毛匪的反抗。其次是流亡到蘇聯的中共首要份子，如衆所週知的王明，他既在大陸無組織的實力，其影響亦隨時而沖淡而為大陸所忘掉，所以，除去寫寫文章作作心戰外，實無實際運用的力量。再次是在大陸上固然有極為廣大、愈來愈多的反毛力量和反共力量，但不是親俄力量，就是有少數的親俄力量，亦只是潛在的隱藏的，而沒有為蘇聯利用的可能。在政治手段窮途的時候，軍事手段不能忽視，因此，我們不能低估蘇聯發動對匪戰爭的可能性。

第三、蘇俄軍事上的準備相當成熟，政治上的準備尚未成熟，正在加強有利自己的努力。政治的準備分為四個方面：其一是自由世界的關係與態度，特別是美國對此一問題的關係和立場的考量與運用；其二是歐洲的安撫問題，蘇聯正在進行安撫西面向東方的工作；其三是蘇聯內部的意見是否一致問題；其四是大陸內部的情勢，如果採取軍事手段，能否在速戰速決中求得政治上的呼應。所以，今天的匪俄關係是戰爭危機中政治戰的運用，邊界談判，就是在這一微妙情勢下產生的。

第四、對匪俄關係展望的結論，意見是：（一）沒有和的可能，（二）邊界衝突隨時均可發生，（三）戰爭危機加深，（四）蘇聯握有戰爭的主動權，（五）目前是不戰不和的局面。我們應該注視他們的演變。

岳先生：

蘇俄隨時均有襲匪可能

目前等待培養政治條件

由於時間關係，我預備根據討論大綱，僅討論其第五題，即「匪俄關係的展望」，也就是「戰與和」的問題。

西德慕尼黑「蘇俄問題研究所」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之「蘇俄時事分析」第五七四期，其標題為「蘇俄對外政策之新方向」，關於此一問題有下列之看法：「雙方首腦都認清，邊境衝突之擴大與人民仇視之增強，必然導致大戰。雖然毛澤東以『紙老虎』形容原子戰爭，他終究還不敢冒這麼大的危險。而蘇俄亦不能不考慮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後之影響，就算此一攻擊

獲得成功，但在共產主義社會，在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在非洲與亞洲各國中，蘇俄之聲望將會澈底喪失。」

以上一段話指出，毛匪不敢冒險發動戰爭，而蘇俄顧慮戰爭對其不良之後果亦不會發動戰爭，故匪俄戰爭之可能性不大。

這篇文章接着又說：「必須指出，假如匪俄邊境危險局勢有某種可能之軟化，但在共產主義集團之兩巨頭間的政治、思想以及兩個政權各方面之矛盾與衝突，也未必能消除。」

這一段說明，毛俄和解之可能性也不大。它的結論是：這共產主義之兩巨頭間未來關係，將陷於一種曖昧的不戰不和的局面中。
我個人大致是同意以上看法，不過還有一點保留，戰爭危險並非完全沒有，且主動操在蘇俄手中而非共匪。這不是憑空臆斷，而是從蘇俄在軍事備戰之實際情形探討而獲得。蘇俄之軍事備戰工作，從一九六六年月底就積極進行，截至去年年底，已整整三年時間，在這三年中已完成一切攻勢作戰之準備，不僅隨時可以發動戰爭，且有贏得勝利之多算。我們對這件重要事實，決不可輕易忽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據俄「紅星報」透露，蘇俄將其駐東德軍副總司令貝立克上將，調為外貝加爾軍區司令。貝立克將軍為一著名之戰車指揮官，而外貝加爾軍區原駐有強大戰車兵團，早在一九四五年日俄戰爭時，該軍區之戰車兵團，曾長驅直入興安嶺，擊潰日軍，是則貝立克之調職，即顯示蘇俄已正式作軍事備戰之工作。

有一點必須指出，當貝立克調赴外貝加爾軍區時，他曾抽調駐東德軍之五個戰車師隨其至該軍區，並將這些戰車師全部開入外蒙，予匪以嚴重威脅。當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匪偽「外交部」部長陳匪毅，曾對此一事實（蘇俄將其駐東歐之兵力，部份調至匪俄邊境），加以公開指責。香港匪情專家黃震遐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毛匪展開「文革」後而中途退潮之原因雖多，其中之一，係蘇俄此項對共匪之嚴重軍事威脅。他的意見，是有參考價值的。

共匪於是不能不提高警覺，一九六七年二月北平「紅衛兵」大字報刊出毛匪備戰命令，大字報中并透露，蘇俄正在動員其地面部隊，其空軍亦在匪俄邊境上空活動頻繁。

一九六七年五月廿二日，蘇俄邊防軍總司令齊良諾夫上將，在該軍成立四十九週年紀念會上說，「蘇俄邊防軍最近常與中共部隊衝突，因此，邊防事件層出不窮，顯示中共對蘇俄確有領土野心。其中發生在黑龍江、哈薩克斯坦邊境者，數以千計，形成嚴重局勢」。不問其談話內容真實性有多少，這是蘇俄積極備戰之最好口實。

是年八月上旬，蘇俄派其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華沙公約部隊總司令雅庫波夫斯基元帥前往遠東視察，在伯力對蘇俄部隊之將士發表演說時稱，他是前來「提醒每一個對祖國負有神聖責任的軍人與部隊指揮官，提醒大家忠誠為祖國效命，勇敢而技巧地防衛蘇俄，并且不惜以血肉和生命保衛每一寸國土不受敵人侵佔」。蘇俄軍事當局以共匪為假想敵，在上項演詞中表示得非常明白。

同年九月廿九日，周匪恩來在接待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之酒會中致詞時，指出蘇俄增兵外蒙及中國東北邊境，係對美國包圍中共之呼籲予以合作。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黑龍江省之珍寶島爆發匪俄軍事衝突後，蘇俄除一面加速完成軍事備戰工作外，一方面俄共領導階層公開指責共匪蓄意挑釁，而軍事當局大力鼓吹攻勢作戰思想。

是年三月間共產國際五十週年紀念會上，俄共政治局委員波諾馬廖夫（主管國際關係）在其致詞中，譴責共匪；而另一政治局委員薛里斯特（兼烏克蘭共黨中央第一書記）於三月廿一日發表演說中，亦對匪大加譴責。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蘇俄國防部軍事史學院系主任奚索夫茲夫著文，主張遵循列寧以攻擊為作戰之基本方式；嗣後，蘇俄國防部長葛里契柯與參謀總長柴哈洛夫均同樣一再強調列寧的「以攻擊為中心之軍事思想」。

經過二年多積極軍事備戰工作，蘇俄已獲得相當成就。於是—九六九年六至八月中，蘇俄遠東軍區司令羅錫克上將，一再在蘇俄報刊上撰文，炫耀蘇俄遠東軍之實力，公開暗示蘇俄遠東軍之假想敵就是毛幫。據西方熟悉蘇俄軍事情況專家分析，蘇俄之一再宣傳毛幫企圖向西伯利亞「武裝移民」之表示，實有掩護俄軍集結備戰之戰略作用。

今年八月六日，俄「紅星報」報導，遠東軍區司令羅錫克上將已調離該軍區，並調西伯利亞軍區司令托爾布科上將繼任羅錫克上將之遺缺。查托爾布科上將為俄火箭權威，前據報導，蘇俄在沿匪俄邊境部署中程火箭部隊有

十二個師，并在外蒙設有中程核子飛彈基地，其射程達二千五百里至三千里，正對準新疆匪原子設置及華北與東北之工業區，是以托爾布科上將調為遠東軍區司令，其用意在指揮火箭部隊作戰，至為明顯。

至於西伯利亞軍區司令一職，蘇俄則調其駐東德軍之第一副總司令賀姆洛上將繼任。賀姆洛在東德時，曾指揮蘇俄駐東德之二十二師最精銳之地面部隊，一向被認為係指揮現代裝備之大部隊最有經驗的將領，彼到任時亦帶來五個駐東德之戰車師。

過去西伯利亞軍區，祇担负補充與教育兵員之第二線性質，現在因賀姆洛上將調任此一新職，該軍區已無形間轉變為第一線之態勢。

究竟蘇俄在近三年內為了軍事備戰，所集結之總兵力如何，我們想引用兩件美、英資料，使我們獲得一個概念。

去年八月中旬，美國「紐約時報」對此一問題有一篇報導，其要點為：

(一)一般軍事專家估計，蘇俄在西伯利亞之駐軍，可能已達一百五十萬人。

(二)蘇俄在與中國接壤邊境地帶軍事實力之增加，為時已達三年之多，繼俄蒙軍事協定（一九六六年六月於烏蘭巴托簽訂）後，俄軍增防便告開始。

從那時起，蘇俄在西伯利亞鐵路幹線上之空軍基地，已開始予以擴建和增大，譬如，在奧姆斯克之空軍基地，其設備之現代化，與跑道之寬度和長度，堪與紐約之甘迺迪機場相比擬。

(三)與此同時，蘇俄在西伯利亞之其他重要城市如艾霍茨克、赤塔、伯力、卡伯諾夫斯克以及伏拉得維斯德克等，也會作出了類似性之軍事設施，甚至其與新疆接壤之地區，特別是在塞爾蓋萊斯克、烏斯特克米諾斯克和阿爾阿塔等城市之空軍機場，亦曾經蘇俄予以擴建。

(四)目前赤塔已經變成蘇俄之一個軍事重心，其軍事實力之增大，為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僅見。

(五)俄蒙在外蒙之兵力，據一般有關之外交家估計，約為八至十個師，而其中蘇俄部隊，且配有火箭武器。

(六)至於蘇俄之次一軍事重心為派蒙鐵路幹線，從烏蘭巴托至榆林間之蘇俄部隊，均配屬有火箭單位，而這火箭均能載核子彈頭，其射程從一百至三百里之遙不等。

另據英國「戰略研究所」去年公報之估計，俄軍在遠東與貝加爾地區之兵力，已達二十個機械化師、十三個火箭師及大量空軍，這些部隊均為「攻擊性之兵種」，決非純為防禦蘇俄邊境用的。

關於匪俄戰爭，日本防衛廳曾作過模擬演習，他們所得的結論是，蘇俄祇需用三個機械化師之兵力，就可以由外蒙趨綏遠直取北平。蘇俄出兵匈牙利與捷克之歷史教訓已明白地告訴我們，蘇俄隨時均有突襲共匪之可能，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蘇俄已完成備戰準備，它所等待的是培養一切政治條件（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設法獲得東歐共產國家以及共產集團之諒解，美俄關係之改善，與中共反毛份子之勾結等），一切政治條件成熟後，軍事行動僅擔任建立一親俄政權之催生任務，決不可認為蘇俄害怕打全面戰與長期戰而不發動戰爭。

鄒宇光先生：

匪俄之間存在有戰爭可能

但亦有不易爆發戰爭理由

主席、各位先生，本人就匪俄關係的展望這部份，提出幾點看法，就教各位。

當前匪俄關係，的確相當緊張而且繼續惡化中，多年來雙方批評、指責、叫囂、詆譖、辱罵已司空見慣，近年來越界衝突，相互攻訐挑釁、侵略的事件也數見不鮮，邇來雙方備戰正積極進行，尤其是大陸毛匪政權更如火如荼，劍拔弩張，儼然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這種情勢發展下去，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匪俄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甚至予人一種印象，很像戰爭危機，已迫於眉睫，其爆發乃指顧間之事。方才各位先生已就匪俄戰爭的可能性，作了許多分析，我想從另一個角度，探討匪俄之間，有沒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這也是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情。

首先要說明的，我同意匪俄之間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可是也有不致發戰爭的可能性，其主要理由和論據為：

第一、匪俄之間，缺乏非用戰爭解決不可，生死攸關的嚴重衝突。不錯

，今天討論大綱第(一)點，就是檢討匪俄關係的癥結問題，分析其基本矛盾和雙方赤化策略的異同，綜括說來，計有下列幾項：

一、爭奪共產集團中領導權，也就是思想上的分歧，俄共譴責毛匪『背離馬列主義的態度』『攻擊科學的共產主義原則』，毛匪也咒罵俄共『……』：一九六〇年以後……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上越走越遠，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對外執行社會帝國主義政策……。』

二、是邊界問題，包括對現存邊界的爭執，邊界河流航行，邊界河流中島嶼歸屬，邊界上少數民族等問題；

三、經濟、貿易商務和技術援助問題；

四、核子武器發展問題；

五、不屬於上列各項的其他問題。

匪俄雙方之間，存在着這些問題，固然是事實，但這些問題的性質和它嚴重的程度，則因報導所用的詞彙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問題說是歧見、分歧、爭執、事件、挑釁、侵略、煽動戰爭、武裝衝突……都可以，而這些問題中，却都是早已存在的。以中俄邊界問題而言，早在十七世紀下半期，即已發生，對於共產國際運動領導權之爭，自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魔死亡後，迄今也有十七年之久，而這些問題，都沒有立即威脅到對方生存、主權或安全的，縱使雙方存有歧見，但也沒有非用戰爭解決的程度。固然歷史上有許多戰爭，是由於偶然因素而誘發的，不過在核子時代，實然發動一場核子大戰的事，尚無所見。

第二、戰爭發生，勢必匪俄兩敗，同歸於盡，自取滅亡。如果匪俄雙方爆發戰爭，不管是核子戰爭也好，傳統武力戰爭也好，侵略戰爭或是反侵略戰爭也好，下列幾點，我們可以肯定的：

一、匪俄雙方都不可能期待從別的共產國家獲得任何支援，包括精神上、道義上和物質上的，甚至於連空洞的同情，恐怕都不易得到。

二、同樣匪俄雙方更不可能從自由世界方面獲得任何支援，類似蘇德戰爭期間英美方面的物資裝備和第二戰場的支援。

三、相反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這種戰爭將深惡痛絕，隔岸觀火，或抱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情，俟待匪俄同惡相爭，同歸於盡而後已。

四、匪俄如果爆發戰爭，可能很快的演成核子大戰，其殺傷破壞之慘烈

，將為人類歷史上開創新紀錄，或者蔓延至中俄全部邊境，擴展至亞洲一大片空間，淪為戰場，十億生靈，勢將捲入此一浩劫，非拚個你死我活，無法中途歇手。試問，這種戰爭，究竟對誰有利？是誰所最企望的？匪俄雙方亦必然先加考慮的。

第三、匪俄雙方國內外情勢，均困難重重，不利於發動此一戰爭，也難於支持此一戰爭。

匪俄雙方同為獨裁統治，表面只是殘酷而嚴密，實際上，人民充滿憤恨怨懟的暗流，一旦戰爭爆發，勢必揭竿而起，首先推翻暴政之統治。且雙方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各方面亦皆困難重重，俄共現政權係在集體領導的制衡下，在一種脆弱基礎上力求穩定，經濟體制一再改革，仍然在繼續蛻化中。至於匪偽政權，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均陷於分崩離析狀態，究竟如何發動此一大規模戰爭，支持此一戰爭，更如何將此一曠古空前的戰爭進行到底，實在是值得令人懷疑的事情。當然，也許可以這樣說：就是因為有這些困難，所以要發動戰爭，轉移人民視聽，加強其垂危之統治。關於這一點，容後再論。

第四、再以雙方現有之戰力而論。在兵員或人力資源上，毛匪擁有一種優勢，但在武器、技能、裝備等方面則遠遜蘇俄，尤其是核子武器部份，更非毛匪所能望其項背者，這一點關係殊為重要。因為一項戰爭的遂行，除了具備有完善的動員能力，甚至以整個戰力，國力以赴從事競賽以外，還要具備有一種決定戰爭的能力，或者掌握一種高度攻擊性武器的優勢而後可，至於雙方的後勤、運輸、補給，均有缺憾，而且都不足以應付大空間作戰之需求，而此一缺憾，又不是短期可能補救的。至於精神戰力方面，匪俄雙方均貧乏異常，可說極其勉強，甚至可說，幾乎全無憑藉，這實在是對匪俄雙方一種絕大的諷刺。

第五、歷史上的殷鑑。自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的大軍攻俄，迄至一九四一年希特勒發動戰爭為止，俄羅斯曾先後經歷七次大規模的戰爭，其結果是四勝三敗。從這個史實中，可以獲得一個結論：在俄羅斯境內的戰爭，俄人都多獲得勝利，同樣在其本土內進行保衛疆土的守勢作戰，多佔勝算，反之，如果從事境外的侵略戰爭，多告失敗。所以，如果俄軍對毛匪攻擊，侵入中國大陸作戰，勞師遠征，自非易事，其後果實不容樂觀，歷史殷鑑不遠，想俄

共當深加考慮。同樣的，一千三百年來，攻略俄羅斯能竟全功的，除了成吉斯汗、拔都等人以外，亦不多覩，而這段歷史，目前更無重演的可能。

第六、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不過使用另外一種手段而已，但是俄共黨徒一向服膺：『戰爭發生，政治失敗』此一教條，目前似乎還沒有到達自甘承認他們政治失敗的地步。而且任何戰爭，都是具有政治性的，世間絕無沒有政治目標的戰爭，也就是說，如果匪俄發生戰爭，其戰爭目標為何？戰爭目標一般有初期、中期和遠期之分，我想摧毁對方具有敵意之現政權，應為雙方之初期目標，也是雙方從事作戰之最低限度的要求！這一點，表面看來不難，但若要徹底消滅毛匪或俄共政權，非佔領對方大部份領土不為功，如此勢必陷入長期作戰的泥沼，無以自拔，所以觸發戰爭容易，欲期以戰爭解決問題，對匪俄雙方而言，都是一件異常艱鉅的事。

第七、以匪俄雙方對存在爭執最烈的邊界問題看來，均會一再表示並同意・反對使用武力，避免衝突，進行談判。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布里茲涅夫在世共大會中曾有云：『兩天以前，北京「光明日報」發出號召，「準備同蘇修既進行普通的，也進行核子大戰」。當然大喊大叫的聲明，到實際可能性，距離是很大的。』毛共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的聲明中也自供：『……中蘇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原則分歧，中蘇之間的原則鬥爭是長期進行下去的……沒有任何理由為邊界問題而打仗。』這種態度，可以說明匪俄之間戰爭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也透露出匪俄雙方對於所謂『分歧』的態度。

第八、對於備戰陰謀之分析。事實上，匪俄雙方都在瘋狂進行中，尤其是大陸毛匪為然。關於這一點，個人覺得，首先要瞭解匪共的策略理論，本質和現象和辯證邏輯的運用。堅定原則，機變運用策略，掌握一切可能形式，從事不妥協的鬥爭，這是共產匪徒所服膺的信條，備戰是一種現象，而現象不是本質，而備戰只是備戰，備可以戰，也可以備而不戰，備戰更不等於作戰，備戰與戰爭之間，字義上有關聯，實際上可以全無關聯，甚至可以南轔北轍，背道而馳。但是毛匪備戰，有其更惡毒陰謀在焉。對內加強榨取、搜括、鎮壓、奴役，而苟延殘喘；對俄恫嚇、炫耀，裝出不惜一戰的姿態，爭取立場，對各共產國家也可使他們發生一種錯覺，發生一種懾服作風；對自由世界也存在一種轉變視聽、使人有另眼相看的心理作用。但是我認為最

主要的陰謀，還是對付美國——美國當前正不擇手段，急於擺脫越戰重負，向脫離東南亞之途邁進，畏戰、厭戰、怕戰的心情，瀰漫朝野，共匪這種不惜犧牲，窮兇極惡的必戰姿態，對於美國當前和今後可能發生的影響，是具有高度的謀略作用的。共匪備戰愈積極，也就是表演愈逼真，美國愈堅信，匪俄之間，難免一戰，美匪關係更有和緩希望，美國既然決心自越南擺脫，眼看共匪如此兇狠，益足加強其開溜的信念，試觀美匪之間的華沙談判，一拍即合，乃極自然的發展，毫無值得詫異之處。

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事件期間，當時俄酋黑魯曉夫一付窮兇極惡的嘴臉，不惜一戰姿態，何嘗不是表演得維妙維肖，但是當故甘迺迪總統宣示其決心以後，局勢急轉直下，化險為夷，一場風暴，烟消雲散，這就是俄共黨徒狡計不逞的一個實例。共匪對美國近幾年來，也曾先後提出所謂『嚴重警告』達四百七十二次之多(迄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止)，這些例證，都足以說明。現象，甚至於事實，儘管是現象，儘管是事實，可是本質上却是另外一回事。總統日前(元月十三日)接見日本外籍記者協會訪問團時，曾對他們指出：『匪俄鬥爭是表裏不一致的，這是共黨的戰略運用……。總之，無論匪俄之間鬥爭的結果如何，他們不可能和解，但也不可能即時發生戰爭……。』其洞燭機微，一針見血，足為自由世界衡論匪俄關係奉為圭臬者。

其次，談到匪俄之間和的可能性。

在這裏，『和』的涵義，有好幾種解釋，可以當和談解，和解、和平、和平都可以，而不管當甚麼解，匪俄之間都不可能和解、和平、不過談判是可能的，而且目前也正在進行。在共產黨徒的觀念中，談判是一種鬥爭，是一種非暴力鬥爭的技術之一，運用得宜，同樣可以獲得豐碩的戰果和預期的目標。

既然和平沒有可能，爆發戰爭的公算又不大，是不是匪俄雙方將陷於不戰不和的局面呢？這個命題的措詞，似嫌機械，應予修改。因為當前匪俄關係，不是戰爭或和平的問題，而是雙方策略鬥爭的問題。他們之間，可以不戰爭，也不和解，但不可能不和不戰。共產黨徒心目中，天下沒有不變的事物，一切在變化、發展中，他們要和平，而又同時鬥爭，在鬥爭中去爭取和平。乍聽起來，好像很矛盾，其實不然，正如他們所慣用的統一戰線策略一般，他們要聯合又要鬥爭，在矛盾中求統一，匪俄當前和今後關係的發展，

亦可作如是觀，這也就是所謂『……正確結合和平的與非和平的革命形式……。從事長時期的不妥協的鬥爭。』的意思。

最後，我願就個人今天的發言，作幾個結論：

匪俄間存在戰爭的可能，同時也有不可能爆發戰爭的理由。

匪俄關係的演變和發展是長期性、複雜性、微妙而富於詭變性的，其關鍵不是和平或戰爭的問題，雙方都在利用備戰而屈人之兵，爭取全勝。

無論如何，共產黨徒的真正敵人，是資本主義，尤其是所謂資本主義城堡的『美帝』，當此緊張而暫時平衡的匪俄對峙局勢中，美國實處於舉足輕重而掌握主動的有利地位，其為禍為福，決於一念之間，亟願能有一明智抉擇，則自由世界幸甚。

桑原壽一先生：

未來戰爭未必放棄日本

日本朝野關心匪俄和戰

今天能有機會來參加貴所的學術座談會，深感榮幸。尤其是，我本人在日本還沒有看到過像這樣對一個問題如此集體熱烈討論的座談會，所以更深受感動。

現在我願就中共與蘇俄能否發生戰爭這一個問題，將日本的一般看法，向諸位先生概括地作一報告。首先應該在這裏指出的是：日本朝野對於這個問題都表示非常關心，因為日本雖在憲法上已明文規定「放棄戰爭」，但未來的戰爭却未必放棄日本，一旦中共、蘇俄之間發生戰爭的話，那日本便可能成為他們雙方所爭奪的對象而被迫捲入戰爭。所以，日本對於此點不僅是關心，而且也是經常保持警惕與研討的。

中共與蘇俄之間的戰爭，可以說存在着必然性與偶發性的因素，我們從這兩種因素中能探討出此一戰爭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照今天的情勢看來，他們雙方都還在竭力避戰，故實際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不大；不過，存在於他們之間的要佔百分之十的偶發性因素依然能導致最後不得不訴之於戰爭。這種偶發性因素在中共方面，約為下列諸點：

第一是中共以所謂「文化大革命」所煽動起來的狂熱性國家主義，它不是僅止於民族主義的內容，而是最具危險性與盲動性的國家主義。

第二是中共政權，很顯然地將完全操之於軍人之手，在形成中的軍人好戰性格，當其在內部政治混亂中為求統一時，將藉對外採用戰爭手段，企圖得逞。

第三是中共對蘇俄的備戰態勢，日積月久，易於一觸爆發。

第四是從歷史上看，中俄關係一直都難正常化，當前兩者的仇視必將與日俱深。

第五是少數民族在雙方邊界衝突中所可能引起的作用。

這以上只是舉出存在於中共一方的幾種能導致戰爭的偶發性因素，至於在蘇俄方面，像這種偶發性因素究竟佔多大比重，則正是我本人願向諸位蘇俄問題專家請教的地方。

最後我願再重複地說一次：今天的日本雖然是念着和平經，放棄了戰爭，但戰爭却不會放過日本。日本朝野之鄭重地關心並研究中共與蘇俄之間是

否會發生戰爭問題，其理由即在於此。

今天臨時奉命來參加此會，事前毫無準備，故僅能就日本的一般看法，簡單報告。剛才聽到諸位先生的高論，極為欽佩，我甚願能在回到日本之後，將諸位先生的高論介紹給日本關心此一問題的人們。

孫桂籍先生：

自由世界各國立場必須明朗堅定 否則即促匪俄一面鬥爭一面聯合

各位的高論，給我很多啟發，非常欽佩。對於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此刻就個人所理解的現象實質及事態發展的背景，簡單來說，我認為：一九六九年三月以後匪俄之間發生在烏蘇里江珍寶島以及爾後發生在新疆省裕民縣區的武裝衝突，是毛共與俄共當權派在中俄兩國人民地緣政治接觸線上，即常之所謂邊界上的具有國際性意義的事件。而以此類事件為楔機，匪俄關係的新發展，經過了十個月的演變，到今天毫無疑義地，已構成爲世紀進入七

十年代國際緊張局勢進一步發展、在亞洲地區的一個最突出的焦點。以目前經由匪俄雙方宣傳機器渲染，以及經由國際新聞報導給人們在感官與心理上所造成印象而言，其嚴重性尤過於五十年代的韓戰，六十年代的越戰。然而其不同處何在呢？

第一、韓戰、越戰是共產集團對自由世界的挑戰。五十年代的韓戰發生於匪俄關係蜜月時期，六十年代的越戰發生於匪俄關係由破裂而走上了敵對的時期。到六十年代最後兩年，既有了蘇俄進兵捷克的那一幕，在共產集團不同國籍的當權派暴力結構之間，就並非不可能兵戎相見。

第二、今天這星球上的人類，依然是處在從第二次大戰反法西斯盟國贏得戰爭而失掉和平那天起，一直持續了廿多年冷戰時代。倘若說「冷戰」者，就是除了避免觸發核子大戰以外，其他手段則無所不用其極的一種戰爭形態，以及因此而來的長期衝突與緊張局勢的發展。那麼五十年代的韓戰是「熱打」「熱和」，到今天問題沒有解決，總算段落分明；六十年代的越戰是由確認匪俄之間的一場「忙接熱線、猛打冷仗」的戰爭已經開始！大規模戰爭不會立刻就爆發，但很快就會和解，那也絕對辦不到——就是這場戰爭初步發展的明顯特徵之一。所謂「接熱線」，想這麼做的人各有用心，但是也有共同默契。像在大賭場上，想立個規矩，扯住對方的耳朵，「叫牌」、「出牌」、「攤牌」。說比的是實力，門的却是謀略。對第三者可以保密，要大家猜猜看：究竟誰能對付誰，與結局對付的是誰？這是最危險的賭博！

倘若說：問題並不這麼簡單，我承認。可是，把戰爭的定義來界定清楚以後，我相信我跟各位的看法是一樣的。進入七十年代，有更多的理由使人信服：以所謂「冷戰」作為手段來解決問題，其問題之解決斷然是取決於備戰過程中綜合戰力的發展。得其道則昌，失其道則亡；都沒有道理，必同歸於毀滅，絲毫沒有可以含糊的！備戰全程中的每一步發展，都具有決戰性的意義；同時其每一步的成功，直接就決定和平的面貌與實質。

俄魯布里茲涅夫，在距今半年以前，珍寶島戰役發生後約三個月，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莫斯科舉行的世共大會報告中有幾段話，部份地透露了匪俄關係新發展的來龍去脈。他說：（以下是摘錄布魯的報告中的語句）

『坦白的說，在不久以前我們還沒有打算在會議上來觸及這個問題。最近發生的事，首先是中共九全大會決定的性質，新的形勢，以及它對整個世界局勢的嚴重影響，迫使我們要談一談這個問題』。『現時北京的立場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形成的』，他接着說『中共的九大，是標誌着毛澤東思想與政治方針進展的一個新階段。中共的新黨章要把毛澤東思想宣佈為現代馬列主義。公開標榜要把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插遍全世界。……這與他們經常鼓吹的戰爭歇斯底里亞氣氛結合起來，就給國際局勢帶來新的因素，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理會它。』

布里茲涅夫要『理會』毛共！就毛俄雙方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敵對態勢來講，今天這『理會』二字，顯然有軍語中『接敵前進』的意味。再就進入七十年代國際冷戰局勢的發展趨向來看：今天在毛俄之間，以及圍繞着它們的四周平行展開的『雙邊』與『多雙邊』的『外交折衝』，即所謂談判；與其在不同層次和空間所進行『政治鬥爭』，即所謂戰略部署。這『理會』二字中確有火藥味；但是也充滿多目標謀略的作用！所說珍寶島的武裝衝突等不是孤立事件，其部份理由即在此。所說這是迎接七十年代出現的新型冷戰，初步露出的面目既非『熱打』、『熱和』，亦非『冷和』、『熱打』，而是『忙接熱線、猛打冷仗』，理由亦即在此。布里茲涅夫所透露的『理會』兩字中，提供了不少的可以作為構想的線索。

布魯面對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共產集團份子，提供了三點所謂『克服紛歧』的辦法。他左手用指頭一一點着毛共與各國共黨腦袋，（儘管說毛共反對世共，它沒出席，而布魯的話是緊接着抨擊毛共的話說下來的）暗中却用右手摸着第三者伸到了莫斯科的長鼻頭，並且向四面八方飛眼神兒。他說：

『一、在現代條件下……問題可以不再這樣提出，首先來解

決紛歧，爾後來協議共同行動。生活需要另一種態度：這些或那些問題

上的紛歧，不應當妨礙在我們同帝國主義共同鬥爭中的共同行動；而來

共同解決與進行統一行動的有關問題。在共同鬥爭的過程中將更加清楚

看出，什麼樣的觀點是符合共產主義運動共同利益，而什麼樣的觀點是與共產主義的利益背道而馳』。在『二』、『三』兩項中布里茲涅夫強

調：『……擴大聯繫與接觸，是國際舞台上行動的協調機構，也是衡

量立場，調整紛歧的一種手段。在現代條件下，雙邊的和多邊的會談，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

隨後，莫斯科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七月十日對其『最高蘇維埃會議』所提出的『國際情勢與外交政策』報告裏，談到對付毛共，以其特有外交詞令，重申布里茲涅夫對毛共的譴責。葛羅米柯所說的話，每一段、每一句都有內容，實在不簡單！其口吻之大，居心之險，用意之深遠，以及語氣態度的凌厲，只看頭尾三段，即可見一般。一開頭，他說：『從我們國家利益和國際情勢的發展觀點來看，蘇中關係問題是有巨大意義的。中國是蘇聯的鄰國，蘇中國界長達七三九五公里，（注意：這裏是葛羅米柯說的話）中國抱著何種目的，中國對外政策朝向何處，亞洲情勢乃至亞洲外的情勢都受到影響。』結尾兩段他說：『現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在伯力雙方代表團就若干國界地區河流船舶航行的狹小問題進行接觸。蘇聯方面對這種會談的舉行給予積極評價。但是很難說，這種談判究竟會有什麼結果。』……他又說：『蘇聯一再表示準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負責代表討論經濟、科學、文化等兩國間有關的問題……蘇中關係的廣泛問題，對不為前提條件所左右的我方準備的談判，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將如何反應，今後將會表示。』今天匪俄雙方間的所謂『次長級邊界談判』之第二回合，又在北平上場。喬冠華與庫茲涅佐夫被拖出來碰頭亮相，長袖子一直還都在遮着半邊臉。這不是他們怕羞，而是這齣戲前後台錯綜複雜，根本對不攏台詞，表裏不一致。……

『人急胡說，狗急跳牆』。動物在緊急情勢下，應付挑戰所作的反應，往往憑所謂機智，或稱之為本能性的謀略。有真、有假，亦有虛、有實。……

把握共產集團份子外交肆應的特徵，一般說來，是分析和解釋其行動及其可能性的一把鑰匙。有一名俄教授 L·N·庫達科夫於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匪俄反目成仇前夕，被派到『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講授所謂『現代國際關係史』，在庫氏的講稿中把馬列主義的外交技巧，亮出了幾套，傳授給他的中國徒弟。其中有這種說法：

『政策』乃是一種科學，乃是一種藝術。而『外交的任務』，就是要找

到具體的方法與手段，以確保對外政策在當時國際環境下的總的方向。外交的任務不僅在於要巧妙的運用對外政策的各種形式和方法，而且要把這些形式和方法與對外政策的其他手段正確的結合起來，以便實現國家的基本目的和計劃」。

『外交為對外政策服務。因此，外交不僅是對外政策的一個方法或手段；外交也是國家在對外關係方面的一種策略。而對外政策是一個國家在對外關係中所追求的目標與所保衛的利益，以及為達到那些目標與保衛那利益所採取的方法、手段、策略的總合。可以說，對外政策的任務，就是國家對外關係的戰略任務』。

『外交為戰爭作準備：它在戰爭爆發前，竭力設法創造有利的力量對比關係，爭取同盟者，孤立未來的敵人。外交結束戰爭：它竭力設法在最有利的情況下鞏固勝利的成果或削弱失敗的影響。即使當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外交也並沒有停止自己的活動，相反地甚至加強了自己的活動，以便為本國創造有利的戰爭條件而為敵國創造不利的戰爭條件』。

『外交遵循國家的對外政策的原則，決定一個較短期內的行為方針』。這個方針可能在同一時期由於當時國際關係的發展，由於國際政治局勢而有所改變！……外交是在經常變化的環境下執行對外政策的任務和方針的……』

以上三段話，乍聽起來殊無新穎之感，然而此詞拿來作我們所要討論的題目的引言，倒也別有趣味。談『匪俄關係的新發展』，透視它們之間進行中的所謂『外交折衝』與『政治鬥爭』。倘若把庫氏原文中所用戰爭兩字的涵意，就七十年代的世界情勢，加以適當其可的界定，或姑且逕以諸如『冷戰』、『衝突』、『堅決的鬥爭』、『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鬥爭』，以及『實質的敵對矛盾，所觸發的現實危機』等等詞彙，暫予代替。我想，那對於我們開展討論問題的思路，也可以有相當的用處。

『軍事方面的現代革命，對於社會生活過程與其現象發展的影響之深，及其規模之大，全般看來，已構成為「時代的條件」。火箭——核武器，與其他新武器的發展、完成、儲存，乃至軍事方面緊跟着而來的許多根本變化，作為客觀現實的一大特徵；那麼，現代人類就不僅只是生活在這條件之中，也是在不斷為它而奮鬥。現在，來估量經由這種軍事上革命所引起的政治後果，從基本上着眼，應該視之為一組社會現象，它確切的是具有國際性。因此，它與國際關係的發展，密切的相互關連在一起。』

『決定國際關係與軍事上革命的異常深刻並相互關連的政治意義，是在於時至今日，跟隨着全球國際關係發展的現實情況，交叉着相應而來的，尚有各種武裝手段的發展。而且這兩組過程彼此交織，彼此糾纏着。』

『國與國的關係，國際關係，演變到成為全般世界性關係的問題，乃是長期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最近十年來格外急劇的加速了這一趨勢的步伐。爾今，國際關係的涵意，作為是政治的、經濟的，以及其他關係的一種複雜的綜合，許多問題動輒涉及整個世界。世界演進的過程，兩種世界性社會制度的鬥爭，世界經濟的發展特徵及矛盾，世界性產業關係的擴大，科學技術革命成果的推廣及滲衍，不僅囊括全世界，而且大大地影響着這星球上個別地區國際關係的發展，以及個別國家間彼此的關係，與多數國家經濟、軍事、政治聯合的內部關係。』

『承認現代國際關係的全面世界性，當然是否認或低估地區的，和局部的國際政治及政治軍事問題的解決。但是，却必須警惕：在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地區的局部的國際政治，及軍事、政治問題的發生、發展與解決，原則上，都跟全般國際局勢息息相關，與全世界各種勢力的實力消長，實力對比，也息息相關。』

尼柯諾夫的話有深度；對今天的毛共而言，也充滿了挑戰的意味！

去年，一九六九年二月，蘇聯科學研究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的月刊裏，以第一篇論文的地位，登載一個名A·尼柯諾夫『軍事中的現代革命與國際關係科學』為題的文章，茲亦摘譯幾段，提供參考。——A·尼柯諾夫說：

關於今日世界，乃至今天以後這星球上人類的命運，包括幾億中國人的前途，在毛共一小撮當權派心目中的映像是怎樣個情景呢？去年，一九六九年四月匪黨九大的政治報告，提到時代發展與國際關係，毛共用白紙黑墨塗下的中國話有下面幾段話：

『毛××在一九六二年說過，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一個世界上社會制度澈底變化的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時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必須準備進行因過去時代鬥爭形式有着許多不同特點的鬥爭』。

『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戰爭。總而言之，我們要有準備。他們一定要打，我們奉陪到底』。

最近毛共『人民日報』、『解放軍日報』、與『紅旗』雜誌所謂兩報一刊發表的元旦社論，標題是『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它是如何認識這個年代的更替呢？它認為：過去的十年，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是毛共它的『三反』——反美、反蘇、反『反』鬥爭蓬勃發展的十年。至於七十年代呢？依照毛共的分析，那是帝國主義將加速崩潰的重要年代。它認為美帝、蘇修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它說：『美帝國主義的急劇沒落，突出的表明資本制度已經走上深刻的、新的總危機』。又說『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出現，不過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它不能挽救整個帝國主義制度的覆滅，也不能挽救它自己的滅亡。所謂「布里茲涅夫主義」，歸根結底，不過是垂死的新殖民主義的變種而已』。

一部沒寫完的人文歷史，主要的是人類心智活動的記錄。因此，我確認思想、觀念決定人類個體與集體行為的實質意義，以及其發展的大方向。而在危急的時候，人為因應處境中紛至沓來的嚴重考驗，生與死的挑戰，其所表現於行為上的反應，因為一時無法措手，可能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表裏錯綜極不一致。但是此所謂『機智』，此所謂『謀略』，持續下去，逃不過歷史的裁判。

以上信手所引述的俄共與毛共雙方的幾段理論性文字，雖然掛一漏萬，匪俄關係新發展

但是就其語文符號所涵有的觀念實質，藉以爲『匪俄關係的新發展，以及對當前雙方進行的「外交折衝」與平行展開的多邊、多角、多目標「政治鬥爭」來勾畫一個輪廓，倒也可以描出個初步的眉目。進一步，也可以循這粗略的輪廓，加以充實，排出細節，並列明層次；然後納入有關問題，對一件件的事實，與一些尚在發展中的隱隱約約的事象，試行加以解釋，賦予意義，作出結論，來印證我們的判斷。』

× × × × ×

因應匪俄關係的新發展，必須多方面提高警惕。

第一、自由世界各國的立場必須明朗、堅定，否則，便是鼓勵匪俄『一面鬥爭一面聯合』，鼓勵它們以自由世界蒙受的損害，去平衡它們共產運動破產的『赤字』。關於這一點，針對前述布里茲涅夫會就何調處共產集團份子間分歧問題提出的三項具體辦法——在要求共同行動中解決歧見，在雙邊與多邊接觸中澄清立場，以及改善互相交換情報的辦法，有創造性的齊一理論的觀點等等。那麼，自由世界的合作，更格外應當加強！

第二、共產集團份子間的『分』與『合』，與自由世界所作所爲的『對』與『錯』，正好成反比。自由世界『錯』，它們不睦也能『合』；自由世界『對』，它們根本就無法再合攏。進入七十年代，自由世界有條件可以做得更『對』、更『好』；那麼所謂共產主義的挑戰，必然會加速消失掉它在國際舞台上以往所扮演的那份腳色，而走上蛻變、死亡之路。

第三、中國大陸上的人民，飽經憂患，對自由世界的嚮往，倍感殷切；對於上述兩點，也看得最清楚。自由世界不可再讓他們失望。歷史上有很多例子：人民因失望而絕望，而發生爆炸性的憤怒的抗議；藉其沉澱於記憶中的歷史映象化裝而出，表現於語言與暴戾的行動。然而，他們迫切要解決的，畢竟是今天的問題，爲了要活下去並且要確知明天比今天更有希望。這並不是傳統文化在作怪；反之，正是因爲文化傳統被暴力破壞的結果！今天國際姑息主義者對這一點太多誤解。其所反映於政策性作爲的可慮之處，關鍵也就在這裏。

胡傳厚先生：

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一天

匪俄間就不會發生戰爭

目前足以影響匪俄關係的國際因素，一為美、俄、匪的三角鬥爭；一為俄共集團與西歐民主陣營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所謂美、俄、匪三角鬥爭，實際上是以美、俄為主角，共匪不過是配角。共匪的力量，遠不能與美、俄抗衡，它所以能與美、俄並列，儼然成爲「三角」之一，主要是由美、俄兩強的冷戰鬥爭而造成。因爲，國際間任何兩強鬥爭，必然造成一種形勢，即兩強均圖拉攏一個或幾個「次強」的勢力，以增高自己的聲勢，對抗或牽制對方，同時阻止這個或這些次強的勢力，被對方拉攏而對己方不利。共匪由於控制了中國大陸廣大的土地、人口，被視爲當前的「次強」勢力，成爲美、俄拉攏，爭取的對象，因而得以濫竽於「三角」之列。

基於上述鬥爭策略的需要，以故蘇俄雖與共匪存在着嚴重矛盾，進行了歷時十餘年的激烈鬥爭，甚至在邊界地區發生了無數次的軍事衝突，仍於去年九月俄舊柯錫金行經北平時，發動與匪談判邊界問題，從而促成目前正在進行的匪、俄談判。美國方面惟恐匪、俄恢復勾結，也急起直追，於去年十二月初主動地與共匪接觸，促使停頓了兩年的美、匪會談，將於本月二十日恢復。

美、俄兩國由於所擁有的核子武力，勢均力敵，雙方均感受對方的軍事威脅，恐懼核子戰爭的爆發，不能不繼續進行核子武器的發展，以求超越對方；但對於無限制發展核子武器所需耗費的龐大財力，均感不勝負擔。因而，雙方都迫切希望能經由談判途徑，對於限制核子武器的發展，達成協議，從而停止這一惡性的軍備競賽，緩和雙方的敵對狀態與國際間緊張情勢。美、俄於去年十一月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預備會談，得以順利進行，並決定於今年四月間易地舉行正式談判，即因美、俄雙方的共同需要和共同願望所促成。

美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成敗，是美俄鬥爭能否緩和的主要關鍵；也是匪、俄關係能否改善的決定性因素。申言之，如果美、俄談判失敗，則美、俄兩國均將加強拉攏共匪；共匪雖與俄共發生激烈鬥爭衝突，可是，匪、俄畢竟同屬共產集團，而且在地理上接近，共匪從基本立場或從本身利害考慮，在美俄兩者之間作一選擇，可能寧願重投蘇俄懷抱，而不願依附美國。反之，如果美、俄談判成功，關係改善，則蘇俄必將對共匪採取更強硬態度，企圖迫使屈服就範；美國對共匪的拉攏，也將止於虛與委蛇。因而，充當配角的共匪，即難免要在「兩大」握手言歡的情況下，慘遭犧牲了。

就目前一般的國際形勢及美俄兩國的實際情況觀察，美俄談判成立協議的可能性甚大，共匪一時似乎處於「左右逢源」地位的好景，不會太長。一度中止的匪、俄北平談判，雖已恢復，氣氛並不良好，已經暴露了失敗的惡兆。

再就俄共集團與西歐民主陣營的關係所予匪俄關係的影響說，蘇俄由於領土橫跨歐亞兩洲，爲了避免陷入戰略上兩面作戰，政略上兩面樹敵的不利地位，必然要權衡情勢，採取「東攻西守」，或「西攻東守」的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俄爲了全力對德作戰，而與日本訂立「中立條約」，及至德國戰敗，再轉而對日本作戰，即爲這一策略的運用。這就是說，如果歐洲方面的敵對形勢緊張，蘇俄必須全力應付，勢將曲意拉攏共匪，力圖緩和俄、匪間的敵對形勢。

可是，目前歐洲局勢的發展，兩個集團顯然都在逐步向着所謂「和平共存」的目標推進。西德布朗德政府，不僅積極致力於促使西歐民主陣營與東歐共黨集團改善關係，甚且不惜放棄德國人民謀求恢復全德統一的願望和立場，而準備與東德共黨政權談判，企圖建立非政治性的關係。民主陣營與共黨集團舉行所謂歐洲安全會議的空氣，甚囂塵上，頗有在今年實現的可能。歐洲局勢有這樣轉變的趨向，蘇俄自然感到「西歐無憂」，不但沒有對共匪讓步妥協、曲意拉攏的必要，而且儘可採取強硬態度，對共匪加強壓力，即使造成匪、俄間更嚴重、更緊張的形勢，也無所顧忌。

不過，由於蘇俄企圖消滅所謂資本主義國家，赤化世界，並以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爲主要敵人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目前與美國及西歐民主陣營改善關係，不過是基於現實利害而暫時採取的權宜措施。因而，無論匪、俄

關係如何惡化，決不致發生大規模的戰爭，而使美國及民主陣營坐收其利。

總統於一月十三日答復外籍記者詢問，斷言：「無論匪、俄之間鬥爭的結果如何，他們不可能和解，但也不可能即時發生戰爭。毛匪死後，中共與蘇俄仍然會為國際共黨領導權而繼續鬥爭，但也不會發生戰爭，因為，他們知道戰爭的結果，對資本主義社會有利。因此，只要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一天，他們不可能發生戰爭。」這是最正確的判斷，同時也闡明了國際因素對匪、俄關係的基本影響。

周之鳴先生：

無論和戰目前蘇俄所要解決的

是怎樣解除匪核武器對其威脅

一、一般國際形勢

對此我特注意美國在匪俄關係中的作為，也即美國對匪俄雙方關係的發展，因為美國在這中間，居于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

蘇俄在最近與毛匪發生武裝衝突，曾有多次均在事先或事後告訴過美國，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其目的，當然是希望美國在匪俄鬥爭中，保持中立，不加干預。而美國也一再聲明，它對於匪俄鬥爭，決採超然立場，更不乘機獲取任何利益。但目前形勢不同，既有美俄談判，又有匪俄談判，更有美匪談判，其中利害關係互有牽連，有如三角戀愛，美國縱欲保持中立，也無法中立，縱欲超然也無法超然。

美俄間的談判甚多，最近則是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雙方在芬京赫爾辛基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談判的結果，據說「情況很樂觀」，並預定今年四月再行談判。正因為美俄談判很樂觀，所以毛匪一再攻擊蘇俄如何勾結美帝國主義包圍毛匪，本月九日且向蘇俄提出正式抗議，當然這一抗議同時也無異對美而發的。

美匪談判即自一九五五年即開始的所謂華沙會談，本月八日美國宣布將于廿日與毛匪舉行第一三五次華沙會談，使業已停止兩年的美匪談判，重新恢復。這與匪俄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有關。因之，共產集團動向，也

前不久，毛匪駐荷蘭一名外交人員投奔自由，毛匪指係美國策動，大為憤怒，當即片面宣佈流會。但蘇俄也同樣反對美匪會談，例如本年一月廿四、廿六日的莫斯科廣播，即一再攻擊毛匪要求舉行第一三五次華沙會談，目的是企圖勾結美帝國主義，共同反蘇。當然這一攻擊，同時也是指向美國的。所以自八日美國宣布將于廿日舉行華沙會談後，莫斯科即開始攻擊美副總統安格紐的亞洲訪問，而輿論界則更紛傳「華沙會談在停頓兩年之後恢復，已使莫斯科頗為苦惱，並已引起美俄關係惡化」。同時，毛匪在匪俄邊界談判第二次會議開始之前，既大肆攻擊蘇俄，並指名謾罵布里茲涅夫。在俄方代表外交部副部長庫茲涅佐夫再度飛抵北平機場時，毛匪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也未至機場迎接，故意予以冷淡。舉行二次談判後，適在美國宣布將于廿日舉行華沙會談之同日，匪大公報更又大放厥詞，謂匪俄邊界談判的毫無進展，蘇俄應負其責，而使匪俄關係進入低潮。顯然，毛匪是在利用美匪華沙會議以要脅蘇俄。

無論美俄談判或美匪談判，匪俄雙方都在爭取美國以自重，三角戀愛的主要還是美國。於是美國務院發言人麥克羅斯基，本月十三日又不得不宣佈：「當我們着手與中共會談之際，我們希望蘇俄能了解那並非是對毛匪與蘇俄間的政見加以利用。」

怎樣利用美俄談判與美匪談判，使之對我有利，這是我們應該鄭重考慮的。尤其是即將舉行的美匪會談，對匪俄關係固有影響，對我反共復國前途，更有阻礙，我們必須密切予以注意。

此外，最近日本對匪外交政策的轉變，越南戰爭的演變，特別是國際姑息主義的囂張，都是影響匪俄關係的因素，我們均須加以研討。

二、共產集團動向

早在一九六〇年一月米高揚會見阿共領導人員時，即曾策劃阿共反匪活動。是年六月國際共黨布加勒斯特會談，毛匪代表也曾唆使阿共代表團成員貝利紹娃反對俄共，貝利紹娃則面斥毛匪代表，並向俄共中央告密。事後，

阿共頭子霍查整肅了貝利紹娃，黑魯曉夫却支持貝利紹娃，斥責霍查。此爲匪俄雙方在國際共黨內部從事派別活動之始。（參閱情報局「共匪重要問題輯要」拙作「匪俄鬥爭問題」部分）

毛匪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復俄共函中，公開承認它在各國共黨內部實行分裂活動，業經製造有所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的親匪派，已有法國、義大利、比利時、西班牙、荷蘭、瑞士、丹麥、芬蘭、瑞典、奧地利、西德、希臘、葡萄牙、英國、美國、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祕魯、哥倫比亞、巴拉圭、烏拉圭、澳大利亞、錫蘭、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約旦、阿爾及利亞以及印度等國的共黨三十四個。當時整個共黨親匪的，還有阿爾巴尼亞、新西蘭、印尼、緬甸、馬來西亞、泰國、日本等七個。後且加上了北越與北韓共計九個。一九六七年三月俄共在其廿三次代表大會前夕，致各國共黨函中也承認國際共黨內部親匪派約有三十個。不過，是月廿九日俄共舉行廿三次代表大會，各國共黨參加的多至八十六個，並有七十六個共黨代表在大會上致詞，一致擁護俄共的原由黑魯曉夫決定的路線，其中且有十三個共黨代表公開對匪加以攻擊。尤可注意的是，原親匪的北越、北韓共黨也參加了，北越共黨並且帶去一個所謂「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共黨。

以去年六月五日莫斯科舉行世界共黨會議而言，各國共黨參加的有七十五個，簽署大會基本文件的有七十三個，發言支持俄共路線的有四十個，其中且有三十六個共黨代表公開攻擊毛匪。此外，致函祝賀的還有印尼共黨。固然，不参加大會的有阿共、北越、北韓、南共、日共等，羅共、義共也取中立態度，在大會指責蘇俄侵略捷克的，更有英國、奧地利、瑞士、挪威、瑞典、西班牙等國共黨，但在俄共對匪鬥爭方面仍占優勢，是相當成功的。

共產集團動向，顯足影響匪俄關係或鬥爭，上述蘇俄策動五國侵捷事件，是個例子。再在匪俄舉行邊界談判後，原爲毛匪攻擊爲俄共死黨的許多共黨，在去年十月一日毛匪僞國慶時，也竟紛紛去電祝賀，這更是個例子。

關鍵當在毛匪在國際共黨進行分裂活動，目前的收獲究已多少？

布里茲涅夫在去年六月世界共黨會議上的報告，說八十八個國際共黨，其中被毛匪分裂而有親匪派的，仍只約有三十個。六月十三日「時代」雜誌的分析，各國共黨內部已有親匪派三十個，惟與上述匪覆俄函中所說卅四個不

同，且有十二個原爲毛匪函中所未列者，此即尼泊爾、紐西蘭、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玻利維亞、緬甸、柬埔寨、多明尼加、厄瓜多爾、圭亞那、印度、印尼等國共黨的親匪派，兩數合計當爲四十六個。「時代」雜誌並說整個共黨親匪的有馬來西亞、星加坡、泰國、阿爾巴尼亞等四國共黨。而據匪報資料透露，則綜計親匪的各國共黨與各國共黨內的親匪派，已有六十多個。（參閱尹慶耀先生著「論莫斯科世共會議」一文列表數字，惟其中尙漏列東歐各國的親匪派）但須注意的，毛匪宣傳的親匪派數字是一事，其力量到底有多少，又是一事。以力量對比言，顯然俄共佔着優勢。否則，毛匪在共黨集團內的力量，如已足以對抗俄共，或甚至超過俄共，則它早已召開親匪國際共黨大會，進一步奪取所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了。以現在共產集團動向，實對毛匪不利。

三、匪俄內部矛盾發展

關於匪俄內部矛盾，足以影響匪俄關係者，我特注意匪俄互在對方內部從事滲透顛覆所造成的矛盾發展。

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舉行廿二次代表大會，黑魯曉夫在大會上對阿共大肆攻擊，並再度猛烈清算史達林，周匪恩來支持阿共反擊黑魯曉夫，黑魔即同時連帶攻擊毛匪，並既在大會上公開號召改變阿共與阿國的領導，更在毛匪代表團面前，公開表示支持毛匪內部的反毛分子。此爲顛覆活動之始。（參閱同上拙作）

高饒事件，根據現在毛匪公布資料，是與蘇俄有關。一九五八年蘇俄提出從軍事上控制毛匪的要求，遭到毛匪堅決的拒絕，翌年五月發生彭黃事件，六月蘇俄即取消一九五七年十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毛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三者顯然是有連帶關係。去年三月毛匪召開「九大」前夕，俄共利用王明即陳紹禹，攻擊毛匪澤東對內十條對外五條重大罪狀，號召反毛分子推翻毛匪政權，更不用說了。

反之，毛匪在俄共內部滲透顛覆，製造有所謂「史達林小組」，並發表很多文章與傳單，不斷「號召蘇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起來推翻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重建無產階級專政」。不久前，又策動組織有所謂「爲在蘇聯重建馬克思列寧政黨而鬥爭的戰士委員會」，「號召蘇聯工人階級擡起鐵臂掃

除叛徒」。迫使布里茲涅夫在六月世共會議上報告，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而說「從北京發出挑釁的號召，要蘇俄人民『完成革命』，在我們國內換一個社會制度」，加以斥責。

這種各在對方內部製造、擴大矛盾，當足以影響匪俄關係的發展，我們自應加以注意。尤其毛匪方面，還有毛匪採取壓迫、摧殘、屠殺政策所形成的大陸廣大人民反毛反共的、既無法妥協更無法解決的基本矛盾。這點我們更應講求策略，加以有效利用。

此外關於匪俄和戰問題的意見

一、列寧說過，和戰依於「力量對比」，和平為再戰的「暫息」，而「暫息為鼓動羣衆作新的戰爭」，「議和是積聚力量的手段」，「退却是為進攻」，停戰，和談都是「爭取時間」，為「適應環境」，必要時，應不惜「在污泥中爬行」。（參閱拙作「蘇俄的戰略與策略」一書）這種和平策略的運用，無論蘇俄或毛匪，均為能手。當然，在今力量對比之下，想要利用和談以壯大自己的是毛匪而非蘇俄，而蘇俄當不會上當。

二、思想分歧與邊界問題，不是戰爭可能發生的原因，我同意鄒宇光先生的意見。不過如說匪俄可能發生戰爭的話，毛匪核子武器發展對蘇俄的威脅，可能是個主要原因。蓋①自一九五七年起毛匪澤東即不斷宣傳鼓動核子戰爭，並說毛匪控制大陸人民雖將死掉三億人，但人類將死掉一半，就可「在死屍和廢墟上創造更多的文明」。意即美俄等國均將變成「廢墟」，而毛匪將在這些廢墟上建立它的共產帝國。②毛匪始終反對核武器禁試條約，並更一直要打破所謂美蘇的核子壟斷。③事實上今日毛匪核子武器的發展，對蘇俄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形成了威脅，且這威脅比之美國，它的感受刺激更大更深。至于足以影響它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當更不待言。④美國是個民主自由國家，它的民族性更大部和中國一樣，是講道德、仁愛、信義、和平的，所以，在它獨占核子武器時，並沒有利用核子武器，對蘇俄或毛匪施加威脅，使之屈服。但統治匪區蘇俄的兩個黨却都是既無理性，更無人性的，它們的一切作為，也都不講道德、仁愛、信義、和平的。所以蘇俄在力量對比之下，對於勢均力敵的美國，固無法利用核子武器，施加恫嚇、威脅，同時，它也相信美國也決不會實施核子突擊，將它毀滅了。反之，對於

目前尚居絕對劣勢的毛匪，既無法容忍其發展核子武器對它的威脅，同時以其黨性相同關係，更深知毛匪再轉弱為強時，必將對它實施核子攻擊，使之屈服。這種生死存亡利害關係，實遠超過思想分歧與邊界糾紛等問題。⑤最後因為毛匪的打破核子壟斷，美俄利害相同，蘇俄認為如以摧毁毛匪核子武器為藉口，當可獲得美國諒解，不致在匪俄戰時扯它的後腿。

三、如果發生戰爭，主動的當為蘇俄而非毛匪。然則，蘇俄將用何種戰爭方式？在毛匪長于所謂人民戰爭或游擊戰之下，聰明的蘇俄，決不會和在越南作戰的美國那樣愚蠢，純用傳統戰爭方式來和毛匪作戰。當然也毋須實行真的核子戰爭。如果我是蘇俄領導的話，一方動員大量機械部隊，集結邊界，擺出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姿態，甚至必要時向前推進若干公里，佔領一、二重要據點；一方加強部署外蒙等地區火箭基地，同時更派遣三、五架飛機，攜帶氫彈，飛臨「北京」與毛匪核子武器製造、儲藏地區上空，警告毛匪，如不屈服即將實施核子突擊的威脅，就可達到蘇俄目的。去年毛匪接受蘇俄建議舉行談判，外電傳說即多由於蘇俄曾對毛匪實行核子恫嚇的結果。

四、無論和戰，目前蘇俄所要解決的，主要決非思想分歧或邊界問題，而是怎樣解除毛匪核子武器對它的威脅。今匪俄談判，縱在邊界或貿易方面獲得暫時的協議，只要上述基本問題沒有解決，匪俄雙方必將繼續鬥爭如故，決無徹底改善的可能。

王健民先生：

邊境談判，不會有結果
小衝突會有，大打不會

主席、各位先生：

本人今天有機會應邀參加 貴所第卅八次學術座談會，深感榮幸。聽了各位先生高明的意見，也受到了許多啟發。

關於「匪俄關係的新發展」問題，由於他們正在舉行邊境問題談判，他們一面秘密談判，又一面公開叫罵，直到今天還沒有談出一個道理來。邊疆談判，本來是一件麻煩的事，但是如果雙方都有誠意，根據條約，依照國際

公法，參照實際情形，仔細商談，是可以談得攏的。但是現在匪俄的爭執並不是邊疆問題，嚴格說來，也不是甚麼思想問題、理論問題，我罵你「修正」，你罵我「教條」，這些都是共產式吵架的口頭禪，沒有甚麼意義，我們局外人看起來如此，他們自己又何嘗不知道。匪俄雙方所爭執的是誰整倒誰的問題，是布（里茲涅夫）幫整倒毛幫的問題，還是毛幫整倒布幫的問題。只要有一方沒有被整倒，他們是有得吵的。

※ ※ ※

關於匪俄邊疆談判，據說，從一九六四年就開始了，但是談來談去，却談出一個去年（一九六九年）三月「珠寶島事件」來了。雙方爭佔位於烏蘇里江中間的一座小島，打了起來，死傷了幾十人。又據說，從一九六四年到去年三月，沿一萬四千五百華里中俄邊境上，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糾紛幾千幾百幾十幾次。這樣，雙方談判就停頓下來了。

到了去年九月，越共頭子胡志明死了，周匪恩來和柯錫金前往致弔，避不見面，柯錫金回程到北平，才和周匪見了面，重彈舊調，恢復談判，於是雙方在北平再談，依然是僵持和相罵的局面。

自從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匪雙方都發表幾次又臭又長的聲明。蘇方一再吹噓她如何幫助中國：如一九一一年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一九二四年訂立中俄懸案解決大綱，一九三七年抗戰初期如何支援中國，以及抗戰勝利後如何支援中共等等。共匪方面則指出一九五八至六〇年的中俄璣瑩條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如何割去中國東北領土，一八八一年伊犁條約如何割去中國在中亞細亞領土，兩者共達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以及俄方所割中俄邊境紅線，如何把沿江部份割到中國江岸上等等。他們這樣算舊賬，蘇方暗示中共忘恩負義，匪方直接攻擊蘇方過去和現在都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兩個暴虜共產政權，互揭瘡疤，痛快淋漓的讓我們局外人讀起來，也有痛快淋漓之感。

我個人感覺，他們兩方對罵，蘇俄方面居於下風，錯在她和共匪算歷史舊賬，因為歷史舊賬是俄國侵略中國，而不是中國侵略俄國。俄國侵佔了中國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這是鐵的事實。所以蘇方說：「中國北境應以長城為界」，匪方就說：「兩千年以前，中國築長城時，你俄國在哪裏？」蘇方說：「北京、伊犁等約劃定的中俄邊境，雙方都簽了字，應該遵守，不算

不平等條約，」匪方就說：「世界上沒有不簽字的條約，如果簽了字就不是不平等條約，世界上就沒有不平等條約了」，並斥之為「強盜邏輯」。罵來罵去，十分熱鬧。說到這裏，我敢說，在偽政權裏面科員、祕書老爺中，必定有反共反俄志士，借毛匪幫的口，起草聲明，把自己反俄的情緒痛痛快快發洩一下。

當然毛匪幫也不是好東西，並不真正愛國，所以蘇方問毛匪：「你爲何在你們黨的幾次大會上說：蘇聯是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國家？」又問周恩來：「你如何在尼泊爾首都對外國記者說：邊疆問題，如算歷史舊賬，就天下大亂了？」毛幫們「愛國」的嘴臉，被「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完全撕破了。

※ ※ ※

但是他們吵來吵去，都不敢碰列寧和史達林，毛幫且把史達林和列寧同稱爲「偉大的」。實則在中國人看來，列、史也不是好東西。蘇俄於一九二九年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說取消帝俄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歸還中國領土和一切特權，則沙皇所奪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應該歸還中國，中東鐵路自然也不例外，但第二次對華宣言却不提這兩點，這都是列寧手上的事。

一九二四年「中俄懸案解決大綱」，俄國不但不還我國領土，連中東鐵路也要共營，這正是繼承列寧的遺志。外蒙是中國領土，這是「大綱」上所確認的，但是那時外蒙已經赤化了，中國實際上並沒有收回外蒙，這是史實，雙方爲何不敢提及？再說史達林。在抗戰期間，中東鐵路已經賣給偽滿了，但在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硬要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又要旅順大連，又要外蒙獨立，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我們被迫承認了，但是史達林違約不按期自東北撤兵，反把日人在東北價值二十億美元的工業設備偷走了，毛幫們，你爲何不啃半個「不」字？至於史達林違約在東北支援林彪，使林匪坐大，從東北一直竄到海南島，自然更隻字不提。雙方做賊喊賊，彼此彼此。

※ ※ ※

現在他們正在北平談邊疆問題，我看很難談攏，因爲雙方都沒有誠意，而把問題扯大了，扯到題外去了。尤其是毛共，他們要趁此機會對大陸人民做一番反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宣傳教育工作。但是毛幫題目做得大，而調子彈得低，主張以不平等條約爲基礎進行談判，這個「基礎」，和俄方是一致的。但是雙方仍有分歧，要點如下：

認。

一、匪方要確定現存的中俄邊境是在不平等條約下形成的，而俄方不承認。

二、匪方要將全邊境線根據不平等條約重新劃定，另訂新約，而俄方主張沒有問題的肯定下來，有問題的，談判劃定。

三、珍寶島匪方認為屬於中國，俄方認為屬於俄國。

四、泊米爾有二萬方公里土地，匪方認是屬於中國，俄方認為屬於俄國

照常理說，這些紛歧並不嚴重，可以獲得合理的解決，但由於雙方沒有誠意，而且弄僵了，就不好辦。例如，沙皇時代所訂不平等條約，在俄國發表對華宣言時，把沙皇罵得狗血淋頭，但現在要蘇方承認其不平等，就不好下台了。又如珍寶島這一個小島理應屬於中國，又不是什麼戰略要地，俄國放棄了也不過九牛一毛，但目前為此事吵翻了，就不好退讓。所以我們判斷，這次邊境談判，不會得到結果。

※

※

※

然則會不會打起來？我以為小衝突會有，大打不會。

第一，毛共方面，不可能大打俄國。大打是要把對方打敗，迫他投降，這對於毛匪，將是不可思議的事。

第二，俄國大打毛匪，也有許多顧慮。現代戰爭，不外兩種方式：其一是核子戰爭，其二是傳統戰爭。蘇俄對匪不會用核子戰爭，因為這種毀滅人類戰爭，誰也不敢輕易嘗試。蘇俄如用核子戰爭，固然可以有絕對優勢將共匪打垮，但受禍者是億萬中國人民，必為舉世所譴責，尤會使美國驚心，而將來美俄一有衝突，美懼俄重施故技，而先下手為強，毀滅俄國。這一後果，俄國不能不考慮。

俄國如採傳統戰爭，則方式又有兩種：一種是如若干西方人士所說，以絕對優勢兵力，突擊共匪原子工廠設備——據說在甘肅境內，又說要搬入其他地方，一舉而摧毁之，然後迅速撤走。另一種是如施岳先生所說，以陳兵邊境的十個裝甲師，二十個裝甲師，從綏遠一舉而拿下北平。這樣，我不能不懷疑：真正打起來，俄軍是否能進行順利？如真能摧毀了共匪原子設備，蘇俄可能達到其此項戰爭目的。但共匪元氣未傷，仇俄更烈，在一萬五千里中俄邊境上，將永久多事，尤其勢若長蛇的西伯利亞鐵路，難保不被共匪以

游擊方式，使其寸斷，蘇俄不能安枕無憂。如擊破北平，問題依然不會解決：蘇軍如擴大戰果，則自己的泥腳陷入泥淖愈深，如不擴大，則在北平不能有所作為，即使弄一個傀儡，也難發生統治作用。何況在其國內，在其東歐附庸集團內以及大西洋公約集團，隨時有乘機而起的以至其後的危險。總之，廿世紀的七十年代，戰爭思想面臨革命，傳統戰爭已失去作用，核子戰爭又不能嘗試，蘇俄為了吵吵鬧鬧的邊疆問題，不惜冒國家存亡的危險以從事大戰，是很難令人想像的。

所以我的估計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匪俄邊境談判不會有結果，但也不會發生大戰。那麼，結果是繼續冷戰，而且越來越冷。

金達凱先生：

俄共想打而不敢打

主席、各位先生：

貴所這次座談會，指定我發言的題目是「匪俄關係的新發展」。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剛才幾位先生講的很詳細，不必重複，這裏只作一點淺短的補充。

最近匪俄間的接觸，主要還是邊境問題。而邊境談判，到目前為止，其大部份時間，是互相攻擊內外政策，很少談到實質問題，故談判毫無進展。據共匪方面的消息，它們所堅持的是先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要求蘇俄軍隊撤離或不進入邊界爭議地區，就雙方武裝力量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後，再全面解決邊界問題。而蘇俄方面則不願自己軍隊在談判期間，受到任何形式的約束，拒絕撤退在爭議地區的武裝力量，以保持其軍事上的主動權。

由此看來，匪俄雙方都無謀和的誠意，只是利用談判來拖延時間，推卸責任，從事戰爭的準備。因此，庫茲涅佐夫雖返回北平，重開談判之門，但問題之無法在會議桌上解決，至為顯然。

不敢打。在蘇俄方面來說，其與共匪之間既無和緩可能，則乘共匪戰備（主要是核子力量）未完成以前，早施突擊，自易操勝算。其在東北和西北邊境之佈置重兵，非僅恐嚇作用，可能有行動上的計劃。故曰它們想打。但是當前世世界局勢，是互相牽制，互相影響，而不是孤立的，個別的。假如一旦蘇俄與共匪衝突擴大，展開大戰，則勢將影響其在歐洲的戰略部署，妨礙其本土的防禦地位，削弱對自由世界的攻擊力量，並可能導致東歐附庸國的羣起背叛。考慮到這一後果，自不能不持審慎的態度。

再看共匪，其形勢更為不利。這因為大陸局勢混亂，各地武鬥未已，「七、二三佈告」和「八、二八命令」，反映出其內部問題的嚴重性。在反毛反共勢力環伺左右的情況下，毛共自不易抽調和集中優勢兵力，在長距離的邊境作戰。（古今中外，凡對外戰爭，其先決條件，在求內部的團結。目前共匪做不到這一點。）特別是大陸的重工業基地，如鞍山、包頭、大慶、蘭州等地均接近蘇俄，在其中程飛彈有效射程之內。如觸發大戰，必將受到蘇俄戰略武器的毀滅性的打擊。所以毛曾對此亦不能不作慎重的考慮。去年十一月七日共匪的聲明說：「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的大不韙，襲擊中共國的戰略基地，那就是戰爭，就是侵略，……」正表明其對蘇俄核子突襲的恐懼。其目前之高叫「備戰」，亦近似夜過墳場之吹口哨，聊以壯胆而已；主要是藉以解決內部問題，並非真有大打的決心與勇氣。

所以今後一時期，中俄共的關係將是一個「拖」的局面。即邊界談判既不會馬上破裂，而邊界緊張局勢一時也不會解除。

這是從正常心理狀態來觀察匪俄的糾紛。假如毛曾或俄曾心理失常，進入瘋狂，失去控制，則小型的武裝衝突，亦有演成大戰的可能性。以上是我對匪俄關係的一點粗淺的看法。

姚孟軒先生：

今後相當時期極少可能發生戰爭 一個沒力量打一個有力量不敢打

我想就正在北平舉行的匪俄談判，提供一點意見。

這次談判主要是談三個問題：（一）緩和邊境緊張情勢，避免武裝衝突的問題；（二）解決邊界問題；（三）擱置兩黨爭執，設法改善「國家」關係的問題。

這一次的匪俄談判，從去年十月二十日開始，至今已將近三個月之久，但連第一個問題，還未能達成協議。匪俄都不願在此時此際發生戰爭，因之，避免邊境的武裝衝突，應該是雙方最容易解決的一個問題。然而，由於共匪堅持雙方應先從邊界有爭議的地區撤退武裝力量，蘇俄則不願在獲得共匪讓步之前，緩和對共匪的軍事壓力，故即連這個最容易解決的問題，也無法得到解決。

解決邊界問題更加困難。共匪於去年十月七日及八日，兩度發表聲明，重申對邊界問題的立場，以之與蘇俄去年六月十三日的聲明作比較研究，可以看出雙方對邊界的東段和西段，都有嚴重爭執，極難協調。一九六四年的談判，就因為雙方立場迥異，而又都不肯讓步，終告破裂，這一次的談判，也不可能出現奇蹟。尤有進者，在匪俄交惡以前，共匪曾多次表示，它與蘇俄之間的疆界，只是「友誼的界線」，而不是通常的國界，因之，也就不存在邊界問題。待至匪俄關係惡化，雙方通過邊界地區互施滲透，又都不斷加強邊界防務，以防止對方的滲透，從而使邊界情勢日趨緊張，並導發一連串的邊界衝突。由此可知，滲透與反滲透是因，邊界問題是果，滲透與反滲透之因若不能消除，邊界問題就無法解決。而很多事例證明，匪俄重開談判後，邊區滲透與反滲透的鬥爭，並未稍趨緩和。共匪一再提出要增強邊防，防備敵人在邊疆地區「組織叛亂」，即其顯例。

在共產制度下，黨政關係實難截然分割，兩個共產政權能否友好合作，主要還取決於兩個共黨能否和睦相處。因此，想擱置黨際爭執，單方面致力改善「國家關係」，無異於捨本逐末，不會有什麼成就。何況共匪已明白表示，它與蘇俄間的「原則性鬥爭」，要長期繼續下去。事實上從匪俄開始談判以來，共匪對蘇俄的攻擊，從未間斷；蘇俄對共匪則是由暫時休戰，進而作影射式攻擊，再進而恢復指名叫罵。匪俄一方面在進行冷戰，一方面又企圖藉談判改善「國家關係」，這是辦不到的事情。黑魯曉夫在位時就有過這種嗜試，但最後是失敗了。

由此不難想見，匪俄要談的三個問題，都很難談出結果。設若雙方都肯

讓步，則緩和邊境緊張情勢，是唯一可商獲若干協議的問題，但即使能就這一問題達成若干協議，也無助於匪俄關係的根本改善。在今後一段時間，匪俄關係仍將處於打打談談的僵持狀態。

進一步分析，匪俄之願意恢復停頓五年之久的談判，又是各懷鬼胎，都另有陰謀。共匪的兩個聲明已露骨暗示，它是想藉談判緩和蘇俄的軍事壓力，它並且公開說：與蘇俄談判是以「革命的兩面策略」，來對付蘇俄「反革命的兩面策略」。蘇俄雖然比較含蓄，但諸多跡象顯示，它主動促成此次談判，也含有策應匪黨反毛勢力，助長匪黨內閣的用意。雙方相同的目的則是，博取共產世界的同情和支持，用以削弱對方的影響力，壯大自己的聲勢；同時，向自由世界施展騙術，勾起西方聯匪制俄或聯俄制匪的幻想，從中謀取利益。雙方既然都是以談判作為鬥爭的手段，則談判不會打開匪俄關係的僵局，已不言可喻。

然而，匪俄間的僵持局面，很難再長期持續，其理由有四：（一）匪俄衝突已由政治鬥爭，擴大至軍事領域。（二）雙方的滲透顛覆活動益趨白熱化，共匪更已在着力提防蘇俄在邊疆地區「組織叛亂」，或策應匪黨反毛勢力形成「反革命割據」。（三）雙方在共產世界和非共世界的外交角逐，已至短兵相接的程度。（四）匪俄雙方面的衝突，已演變成美俄與共匪三方面的勾心鬥角。

這裏涉及一個問題，匪俄間會不會爆發真面目戰爭。對這個問題，大家說的很多，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略加補充。匪俄間的鬥爭，都是依據有限度的目標，在蘇俄是傾覆毛匪反俄政權，使北平重投莫斯科懷抱，或是準備在毛匪死後，扶植親莫斯科的共匪政權，在共匪是傾覆蘇俄的「修正主義」統治，使蘇俄回到史達林時代的舊軌，並使北平在共產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發言地位。領導權之爭使雙方無法妥協，但有限度目標再加上共匪沒有力量與蘇俄打仗，蘇俄雖有力量打共匪，惟投鼠忌器，也不願輕啟戰端，故雙方都企圖用政治方法，來解決對方，而不肯訴諸武力。是以自匪俄交惡以來，雙方關係曾數度瀕臨決裂與戰爭的邊緣，但隨之又向後撤退。匪俄一個沒有力打，一個有力量而不敢打，在今後相當時期內，雙方極少可能發生戰爭。自由世界若將人類免於被赤化的命運，寄託於匪俄大戰，實屬不智。

關素質先生：

目前會談不會產生結果 仍是不戰不和僵持局面

諸位先生，我對匪俄會談的背景及目的，表示一點意見。

（一）俄方需要緩和匪俄衝突的背景：（1）布柯政權是個集體領導的政權，俄共中央十一名政治局委員（①Breznev, L. I., ②Koçigin, A. N., ③Podgornie, N. V., ④Suslov, M. A., ⑤Kirilenko, ⑥Mazurov, K. L., ⑦Polyansky, D. S., ⑧Shelepin, A. N., ⑨Voronov, G. I., ⑩Pelishe, A. Ya., ⑪Shelest, P. E.），在俄共黨內均有代表性。政治局決定政策，必須經過俄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大多數中委通過。俄共決定與毛匪會談，自然獲得俄共中央全會之同意。（2）其次俄帝需要會談的國內因素，蘇俄目前最重要是從事經濟建設，以解決工農業經濟上的困難，任何性質的戰爭都不敢打。布柯目前新政策，反黑魯曉夫路線，最主要的是反對「黑魯曉夫的冒險主義」，蘇俄不願意以戰爭解決匪俄衝突，最簡單的道理，蘇俄很明白一旦與共匪發生戰爭，首先就消耗了蘇俄的軍事實力，首先就要受到美國的威脅。（3）去年六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世共大會，暗中似有促使匪俄雙方以談判來解決衝突，這是俄共受到國際共黨的壓力。

（二）然而，在毛匪方面被迫接受談判的背景如何呢？（1）由於這幾年來文革的破壞與混亂，人民起來反毛，這是大陸人民對毛匪最大的壓力。（2）所謂毛匪澤東的崇拜，威信，急速的低落，請看「人民日報」上種種事實的透露，不再多舉例子。（3）匪軍人的領導力的增強，可以從匪軍人在政治上的活躍反映出來。在毛匪政治局中，軍人佔半數，中央委員會中軍人佔百分之四五，相反的，顯示毛匪親信集團權力的低落，因此判定周匪與柯錫金會見，接着庫茲涅佐夫與匪方會談，背後獲得匪軍人的支持或林匪彪之同意。（4）蘇俄駐在匪俄邊境的軍事實力壓迫毛匪接受會談，使毛匪叫打也不敢打。

（三）匪俄會談的目的：（1）雙方均在運用政治戰和外交戰。（2）蘇

俄希望緩和邊境衝突，但雙方思想戰照樣進行。（3）蘇俄希望改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4）目前會談不會產生結果，雙方仍在不戰不和僵持局面中。

操揮青先生：

匪俄對外目標仍然一致

發生戰爭可能尚屬遙遠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就匪俄關係的新發展，舉行學術座談，本人特就討論提綱第三節最後一段，關於「軍事備戰」方面，提出淺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戰爭已非單純執行軍事政策之手段，而是執行政治政策手段之一。克勞賽維茨論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如以繼續二字視戰爭為解決政治問題的最後一着，那就完全錯誤。舉例言之，以色列對阿聯的政治問題，並未因以色列在戰爭中獲得勝利而告解決，韓越的政治問題，亦未因美國付出軍事代價而告結束，這個定律，在今後甚至還有若干戰爭，亦不能以單純軍事手段解決問題。

匪俄關係發展至現階段，似乎由軍事衝突又轉變為政治鬥爭，這個循環式的發展，不自今日始，本不值重視，惟目前一般重視之問題，為匪俄究竟可不可能發生戰爭，雙方對戰爭的準備究竟如何。就本人觀察，其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尚屬遙遠，因為匪俄都是共產主義政權，現階段它們的共同敵人，不是自己，而是資本主義，故匪俄自珍寶島事件以來，雙方雖然罵戰激烈，也發生多次流血事件，但匪俄在邊境軍事部署，並無重大變化，這說明匪俄在現階段不至打真面目的戰爭。

如果以純軍事觀點來看匪俄的戰爭潛力，以及邊境地略因素，則非常顯明的是蘇俄居於絕對優勢地位，因蘇俄現有之中、長程及洲際核子飛彈，其射程已涵蓋整個中國大陸，再加以蘇俄控制偽蒙，直接瞰制中國遼西及河西走廊，不僅使共匪對東北、新疆用兵感受威脅，更使北平處於第一線。蘇俄在這種優勢地略條件下，隨時可依其機械化部隊，對共匪進行閃擊作戰，如直趨山西，可切斷偽都與甘新核子基地連繫，如直趨北平、新疆，可摧毀偽政權及其核子設施。但蘇俄直到目前，尚沒有準備這樣做，甚至連共匪在邊界談判的聲明中，亦僅提出若干爭議地區如一島一哨之問題，而不涉及重大地略衝突問題，這說明匪俄當前的衝突，尚未發展至決定性階段。易言之，匪俄雙方在其共同敵人——資本主義尚未消滅之前，合作既不可能，其以戰爭為解決政治問題手段之一，雖非絕無，但其可能性仍不甚大。

再就共匪於本年元旦，其兩報一刊所發表的社論，透露毛匪最近指示，仍在煽動全世界人民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這不僅是指蘇俄，同時更是指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帝國主義是侵略者。匪報又稱，美帝沒落，蘇修破產，如果就共匪的統戰理論來解釋，在消滅主要敵人之後，下一步就消滅次要敵人，資本帝國主義是主要敵人，那麼社會帝國主義就是次要敵人。相同的，蘇俄也是一樣，其對敵人名次排列，在其公開文件中，除稱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之外，對共匪僅稱為馬列主義叛徒，這說明資本帝國主義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社會帝國主義，和馬列主義叛徒，是人民內部矛盾，變轉為對抗性矛盾，但亦可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由此可知，現階段匪俄鬥爭，不論發展如何激烈，其對外目標則仍是一致的。

主席結論：

聽到了各位先生的高見以後，我想綜合大家的意見為下列幾點：

- 由於共產主義的沒落，國際共黨內部以及匪俄之間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相互矛盾，更由於自由世界的反共鬥爭力量之加強，尤其是自由中國之存在、壯大，已導致中共內部之紊亂，構成為對中共之嚴重威脅。因此，匪俄之間由思想理論、策略路線的鬥爭而至兩個政權之間的利害衝突，持續而擴大乃是必然的，決無和解妥協的可能。
- 目前雙方均在加緊備戰，劍拔弩張，從現象上觀察，似有導致全面大戰之可能，但是雙方也在力求避免戰爭，圖

將戰爭轉嫁到對方與第三者的身上，坐收漁利。換言之，戰爭的必然性不大，而其偶發性之增長，如好戰的情緒，仇視的增加，軍人的得勢，邊疆少數民族的糾紛，內部的需要，自由世界的反應行動，都是值得研究的。

三、雙方關於目前的緊張局勢，有其必然性，但亦為雙方策略之運用而有意造成的，希圖以此緊張局勢，玩弄並分化自由世界以達到減少內部危機，並減輕外在壓力的目的。一方面證明了匪俄本身的虛弱，一方面也是對自由世界之挑戰。

四、現在自由世界最要緊是先求步調一致，不可自亂步驟，若以為匪俄之間會爆發戰爭因而向共匪伸手，以為可以牽制蘇俄，那麼匪俄的軍事戰爭未打，而自由世界的政治戰已經敗了。

五、就我們自由中國而言，我們知道共產黨一向是表裏不一，因此和他們講和平，應注意它鬥爭的事實；而他們在叫囂備戰喊打的時候，應注意它陰謀企圖之所在。我們希望自由世界的執政者，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當局，在決定政策，採取行動時，能照顧到全盤的、基本的、整體的利益而不為匪俄任何一方所利用。

(上接第41頁)

(二)通過五年經濟計劃，和一九七〇年預算。

(三)此次各共和國常會中有幾個特點值得一提的：

1. 各共和國均利用紀念列寧百年誕辰，加強舉行社會主義競賽。

2. 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外交委員會選舉潘友新代表為主席，顯示匪俄衝突中，蘇俄中共問題專家，政治地位提高。潘友新年六五歲（一九〇五年生），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一九三八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一九二〇年—二一年參加紅軍，一九二三年—二四年鐵路工人，一九二四年—一九年在邊防軍中工作，一九三九年—一四年駐中華民國大使，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任俄駐美大使，一九五二年—一五年任駐共匪大使，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七年在俄共中央機關工作，一九五九年升俄共中央部長（外事部）。黨內政治地位：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俄共中央檢委，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升候補中委，一九六六年檢委，最近幾年彼之姓名經常在「真理報」上出現。

3. 從五名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出席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常會，可以看出彼等與俄羅斯共和國之黨政關係：

① 政治局委員沃洛諾夫Voronov, G.I. 兼俄羅斯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
② 政治局委員基里林科Kirilenko, A.P. 主管俄羅斯共和國黨務。
③ 政治局委員馬祖洛夫Mazurov, K.L. 領導俄羅斯共和國工業。
④ 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Suslov, M.A. 領導俄羅斯共和國思想和意識形態。
⑤ 政治局委員貝爾謝Pelishche, A.Ya. 彼為一九一七年時代被選為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代表，與俄羅斯黨務關係太深。

政治局候補委員格里辛Grishin, V.V.，彼從一九三七—五六年在莫斯科市任黨政工作已有十九年歷史，現任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

五 動向

(一) 從去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世共大會所通過「為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年告人民書」，以及此次所公佈「紀念列寧提綱」，可以看出：①加強宣傳列寧主義在羣衆中之影響力；②動員世界各國人民和青年進行反帝和反美；③擴大發行列寧著作，並煽動各國共黨加強學習列寧著作。

(二) 從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俄共「真理報」報導，土庫曼共和國黨中央召開中央全會，俄共中央派主管組織工作之書記卡比托諾夫Kapitonov, I.V. 監督，免除土庫曼黨中央第一書記阿維索夫(Ovezov, B.)之職務，理由是在工作上犯嚴重之錯誤。阿維索夫係一九四三年俄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一九六〇年升土庫曼黨中央第一書記，這一事實說明俄共黨內人事鬥爭相當嚴重。

阿維索夫·巴里西（一九一五年生），一九六六年俄共第二十三屆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委，一九三九年加入共黨，一九四三年在俄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一九四九年在土庫曼首都教育學院當校外生（拉丁文externus，不上課允許考試之學生）。一九三九年—一四〇年任土庫曼共青團中央書記，一九四〇年—一四一年任土庫曼教育人民委員部副部長。一九四一年—一四二年任土庫曼黨中央機關工作，一九四三年—一四六年任省、市黨部第二書記，一九四六年—一五〇年任土庫曼中央書記，一九五一年—一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任土庫曼部長會議主席。一九六〇年六月升土庫曼黨中央第一書記，一九五二年任俄共中央檢委，一九六一年升俄共中央中委。